

履行加入 WTO 承诺与中国经济区域间竞争格局 ——静态分析与动态预期

赵伟, 陈勇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2001年末至2005年是中国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履行“入世”承诺的各种效应将不断显现。本文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履行承诺对于中国三大地区经济竞争态势的影响。分析表明:在静态意义上,中西部地区无论在制度方面还是在产业结构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但从动态意义来看,随着履行加入WTO的基本承诺,三大地区之间的某些竞争环境将趋于一致,由此将导致现存区域经济竞争格局的重构。

关键词: 加入WTO;履行承诺;区域经济;区域竞争;竞争格局

中图分类号: F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154(2003)06-0037-0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加入WTO是以政府承诺为前提条件的,基本承诺反映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及其9个附件中。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的四年(个别项目持续至2008年)内,属于中国履行承诺的“过渡期”。客观地来说,履行加入WTO承诺将对中国经济各主要方面产生巨大而长远的影响。按照经济学之行为——效应(behavior-effects)思维定式,可以分析、预测履行WTO承诺对中国经济的各种效应。但在所有效应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效应,当是区域经济竞争格局变化效应。原因在于,经过20多年持续的市场导向的改革与快速工业化推进,中国经济决策的区域分权格局(de-centralized pattern)已经成型,加入WTO冲击将在很大程度上分解到各个区域,应对WTO冲击的各种具体政策措施,都有赖于区域层次的决策与行动。

客观地来看,作为大国经济的中国经济,目前至少形成了三个层次的经济区域类别:第一个层次是国民经济,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第二个层次是大区域经济,即在东部、中部或者西部大区域之下,分别存在着一些发展层次相近的区域,可以视为“二级区域经济”。在所有二级区域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三大工业化地带,即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湾地区。第三个层次是省、市际经济,即在各个二级区域经济之下形成的包涵若干个省、市的区域经济,最著名的是长江三角洲之江(苏)-浙(江)-沪经济区,环渤海湾工业化地带之下的京-津-唐经济区。可以肯定地说,履行加入WTO承诺,对于上述三个层次下的不同区域经济都会产生某种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将不是划一的,影响程度既与各个层次区域经济的竞争能力直接相关,也与各区域在区域经济竞争与融合中所处的地位密不可分。这里主要分析履行“入世”承诺对国民经济层次即三大地区经济之间竞争格局的影响。因为在所有上述三个层次的经济区域类型中,大区域之间竞争格局的变化,最具战略意义。大区域之间竞争格局的变化,不仅将直接左右着下一步三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走势,而且还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部门深度与区域广度。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历表明,在一个大国经济中,工业化进程不仅在深度上有“初级”(primary,或译初次)与“二级”(secondary,或译

收稿日期:2003-04-08

作者简介:赵伟(1955-),男,甘肃平凉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次”)之分,而且在地域上也有这种划分。由此不难推断,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中,工业化、现代化也有深度与广度上的初级与二级划分。

二、静态分析之一:体制差异正在转化为区域竞争力差异

纵览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可以将中国“入世”承诺概括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贸易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第二类是开放市场。其中贸易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承诺,不少于四项:(1)市场游戏规则的全国一致性;(2)贸易政策法规实施符合WTO基本的透明度原则;(3)政府行政行为经得起WTO审查;(4)落实对于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与非歧视性原则。开放市场同时涉及到三个市场,即工业品市场、农产品市场与服务贸易市场。

兑现上述承诺,尤其是开放市场承诺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是,区域竞争压力的趋同化。可以预料的是,在“入世”后三、四年内,中国各大区域经济面对的外来竞争压力在迅速增大的同时,将趋于一致起来。由此,在面临同样竞争压力下,那些竞争力相对高的区域,将获得最大的利益,而那些竞争力相对低的区域,将招致损失。作为转型经济,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制度转型进程直接联系在一起。最能抵挡得住外来企业、商品竞争的,是那些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区域,而最经不住外来竞争压力的,则是那些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地区。由此而使目前存在的区域制度差异转化为区域竞争力差异。

关于区域之间体制改革进程的比较,笔者有三个基本的判断:判断之一是,区域制度差异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层面而非宏观经济层面。因为宏观层面的体制与政策由中央政府直接把握,区域之间不可能有大的差异;判断之二是,微观体制层面区域差异主要存在于第二产业,相比较而言,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区域体制差异较小。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一产”还是“三产”,体制改革的进程主要是由超区域的决策层把握的。其中“一产”中的“生产责任制”是由中央政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目前依然是全国通行的体制:“三产”的主导性行业——银行金融、非银行金融、电信、运输等等,大多实施“一级法人”治理体制,其体制改革由位于北京或上海的“总部”决策层负责,地方政府运作的权力极其有限;判断之三是,“二产”之微观体制差异主要反映在企业制度差异上。而对于企业制度改革进程差异,要找到一种既可以量化分析同时又可以评判改革优劣的指标,最方便的便是一个地区“二产”(或工业)产值中“改制”企业产值比重之高低。

按照产权归属,国家统计局将中国的企业分为四大类,即国有(1999年以后改为“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城乡个体和其他。其中其他基本上由两部分企业构成:一部分是外商(包括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另一部分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我看来,后三类企业,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改制企业,它们是完全或基本适应市场竞争的,只有国有企业,尚未彻底改制。如果以上述企业分类出发判断区域间“二产”制度变革进程,则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便显得十分明显。统计资料计算显示,到九十年代末期,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产值已经降到1/4强,几个发达的沿海省份,几乎全在1/5以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比重,几乎所有中西部地区,该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越是欠发达地区,该比重就越高。由此不难推论:沿海地区制造业中企业制度的变革最为深刻,相比较之下,中西部地区多数省区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

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由于其体制固有的弊端,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即使半封闭市场下,只要存在一个富有竞争力的非国有企业部门,尤其是私营企业部门,都难以适应竞争,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制造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企在大多数竞争性行业面临的前景,将不容乐观。就区域之间竞争力而言,目前哪个地区制造业中之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较高,经济竞争力则较低。

按照上述判断,在静态意义上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加入WTO初期,东部地区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中西部地区则处在相对不利的地位。

三、静态分析之二:产业结构差异正在转化为区域竞争差异

除了区域制度差异而外,随着兑现加入WTO承诺,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在转化为区域竞争力差异。因为不同产业面对的竞争压力并非是划一的。

关于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分析:一个是次产业结构,即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另一

经济史家普遍认为:美国工业化以内战(1861-1865)为分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亦有学者将内战前的工业化称作“初级工业化”,而将内战之后的工业化称为“二级工业化”。

是个小产业结构, 即大产业之下的行业、部门结构, 主要是“二产”与“一产”内部的部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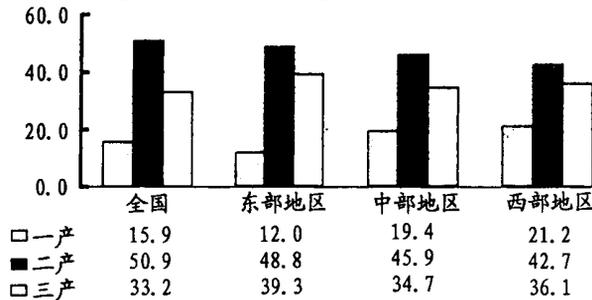
大产业层次的区域竞争力差异, 与各产业总体面临的压力以及各区域产业结构直接相联系。关于各大产业“入世”后面临的压力, 笔者的分析表明, 未来面临竞争压力最大的将是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 相比较而言, “二产”压力较轻。其中“二产”压力相对小的原因主要有二: (1) “二产”制度改革走的最远。其标志是, 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非国有企业部门, 其产值已经占到部门总产值的 3/4 左右; (2) 中国“二产”参与国际分工, 主要仰仗其低附加值的劳密型产品制造业, 与发达工业化国家进行的贸易, 大多属于互补性的, 而非竞争性的。“三产”缺乏竞争力主要与这个产业制度改革滞后、垄断盛行有关。至于“一产”, 尤其是该产业的农业, 显然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由此不难推断, 未来在兑现 WTO 市场开放承诺进程中, 哪些地区“一产”比重大, 那些地区将处于劣势, 哪些地区“二产”比重较大, 则将处于相对有利地位。

“二产”内部竞争压力的不同, 与该产业内部行业结构直接联系在一起。由于加入 WTO 之后我国“二产”面对的不仅将有来自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进口竞争, 而且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其中发达国家主要是工业制品, 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初级产品。可以预料的是, 目前哪个地区“二产”结构中 with 工业化国家处于互补性态势的行业比重大, 初级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较小, 该地区将处于有利地位, 反之则可能处在相对不利的地位。

至于“一产”之农业内部行业竞争压力差异, 则主要与农业产业内可贸易产品结构差异直接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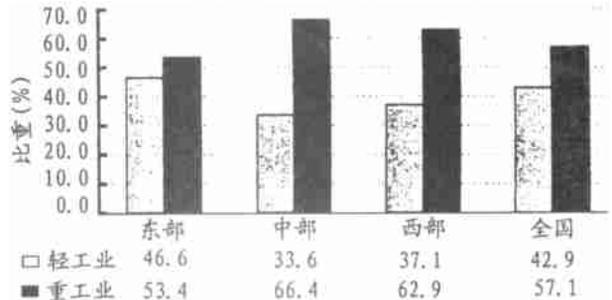
客观地来看, 目前在所有上述两个层次上, 沿海发达地区都占有结构优势, 就是说, 其结构有利于抵挡外来产品的进一步竞争。相比较之下, 中西部地区大多处在弱势竞争状态。其中的原因, 可以借助有关统计数据分析得出。分析表明: (1) 沿海地区已经接近完成工业化, 大产业中“二产”比重高, “一产”尤其是农业比重已经降到很小的份额。相比较来看, 大部分内陆省份, 均处在工业化中前期, 产业结构中“一产”尤其是农业比重较大 (参见图 1); (2), 大部分沿海发达地区, “二产”内部与发达国家处于互补状态的行业——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占比重较高, 初级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行业比重较低, 而内陆地区多数省份的“二产”中, 基础工业、重化工业比重较高 (参见图 2), 资本、资源密集型加工业比重较高, 多数行业不仅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处在竞争态势, 而且与资源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之初级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处在竞争态势。因此“入世”后的竞争地位将不容乐观。

图 1 地区 GDP 产业结构比较 (2000 年) 单位: %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1)。

图 2 区域工业结构比较 (1998 年)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0)。

至于“一产”中的农业, 区域竞争差异更为明显。由于气候、土壤等原因, 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大宗农产品为小麦、大豆、玉米等北方旱作产品, 东部沿海地区则主产大米。这一农业生产上的区域分工, 也将置入 WTO 后的中西部地区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为富有竞争力的北美农业, 同样属于北方农业, 与中国中西部农业处于某种竞争状态。比较研究揭示, 1990 年代末期以来, 上述中西部地区主体农作物产品价格, 均持续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其中小麦价格平均高出国际市场 15% 以上, 玉米价格高出 23% 以上, 大豆油价格高出 30% 至 46% 之间。

显而易见, 在加入 WTO 进程中, 目前业已形成的区域产业、行业结构差异, 正在转化为区域产业竞争差异。

四、动态分析与预期: 环境趋同化与区域竞争格局

从动态意义来看,随着中国政府兑现加入WTO的各项承诺,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的竞争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竞争环境的区域趋同化将不可避免。这种趋同化将至少在四个层次上发生:

第一个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一致化。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沿海经济特区发起与推广的,过去20年以来对外开放政策在区域上呈现出鲜明的厚此薄彼的特征。到1990年代后期,从沿海经济特区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政策存在四个阶梯:最高阶梯是沿海经济特区,实施最为优惠的政策;其次是沿海有限的“开放城市”,实施仅次于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再次是整个沿海地区,实施比较优惠的开放政策;最低阶梯则是广大内陆地区,实施没有优惠的开放政策。加入WTO的基本承诺之一是统一全国贸易政策,按照《议定书》的说法是:“《WTO协定》和本议定书的规定应适用于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包括边境贸易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在关税、国内税和法规方面已建立特殊制度的地区。”动态地来说,随着“入世”各种承诺的兑现,尤其是关于贸易政策全国“一致性”的承诺,上述厚此薄彼、区域有别的对外开放政策,正在成为过去,未来的开放政策必将呈现“特区不特,内地不内”的特征。这一变化,无疑将促成开放政策的区域趋同化。

第二个是对外开放产业、行业的宽泛化。客观地说,中国对外开放在产业与行业上一直是极不平衡的。就三大产业之间的开放进程而言,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开放,多半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主体行业。其中“一产”虽然有开放,但吸引力不大,“三产”主体行业的开放,要么停留在形式上,要么限定在沿海特定区域。而在三大产业内部,尤其是制造业内部,主要行业间的开放也极不平衡。即使在制造业,开放的主要是轻型加工业,重化工业、基础工业的开放则远远不足。产业、行业间不平衡的开放进程,无疑影响着区域经济间的开放进程与竞争格局,因为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许多产业,尚属于国家垄断行业,难以对外开放。随着中国兑现加入WTO承诺,产业开放上可望发生两个变化:其一,“三产”之主导性行业的开放,尤其是金融、保险、电信及商品零售与批发业的开放;其二,“二产”中那些目前仍然由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的开放。上述趋向将不仅会改变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而且会改变这些产业、行业比重较高地区的企业产权结构。而这些改变,无疑将加强中西部地区产业的竞争力。

第三个是区域制度趋同化。制度趋同化可以视为开放政策区域趋同化、开放部门宽泛化的间接结果,但将主要是“竞争性改革浪潮”的结果,后者则由WTO冲击波所引发。种种迹象表明,自1999年中国“入世”步伐加快以来,区域(包括县域)间经济竞争加剧,竞争正在促成区域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竞赛,由此掀起一场竞争性改革浪潮。目前已有充分迹象显示,在中西部地区正在发生用东部非国有企业、私人投资改造国有企业的倾向。可以预料的是,随着这场发自基层的竞争性改革浪潮的深入,区域间的体制落差将迅速趋于缩小,其中缩小最快的当为企业产权制度。

第四个是区域开放重心的趋同化。我的研究(赵伟,2001)揭示,一个内部区域经济的对外开放属于一种二重的进程:国际化与区际化。从区域层面来看,工业化起步时期一国经济开放重心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置于国际化一边,要么置于区际化一边。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区域经济开放的重心位于国际化一边,总体上带有重国际化而轻区际化的片面特色,但随着加入WTO,已有明确的迹象显示,中国正在掀起持续的区际开放浪潮。各区域经济的开放重心,正在由片面的国际化向国际化、区际化并重转移。各个区域对于区际贸易、区际资本流动给予的待遇,正在与外贸、外资看齐。在这场区际化浪潮中,内陆地区可望得到较多的实惠。因为在国际化开放方面:这些地区没有区位优势可言,难以与沿海地区竞争。但在区际化开放方面,则具有与沿海同样的区位优势。

上述所有变化都意味着,动态地来看,“入世”后区域间竞争格局将发生朝着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变化。

参考文献:

- [1] 赵伟. 区域开放:中国的独特模式及其未来发展趋向[J]. 浙江学刊, 2001.
- [2] Zhao Wei. China's WTO accession: Commitments and Prospects [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Geneva, Vol. 32, No. 2.
- [3] 吉尔伯特·菲特, 吉姆·里斯. 美国经济史[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编辑 鲍观明 校对 鲍观明)